

文化创伤教育的三个基本论争

——以犹太大屠杀的教学为例

齐立旺

摘要 文化创伤是集体成员因对于某个惊恐事件的记忆,觉知到彼此共享的苦难而产生了共同的身份认同,从而在集体意识中留下的创伤印记。本文以犹太大屠杀的教学为例,讨论国外文化创伤教育中的三个基本论争。在教育目标上,主要的争论在于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两种不同取向;在年龄适切性上,主要的争论在于何时对学生开展大屠杀教育;在仇恨言论(主要是大屠杀否认言论)的处理上,主要的争论在于是否以及如何使其参与课堂讨论。

关键词 文化创伤教育; 目标; 年龄适切性; 仇恨言论

作者简介 齐立旺/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讲师 (南京 210097)

文化创伤,指的是“当集体成员感觉到自己被置于某惊恐事件中,集体意识因此而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他与该事件相关的记忆自此有了永久的标记,并使其未来的身份从根本上发生了无可逆转的改变”^[1],大屠杀是文化创伤的典型事件。然而,历史一再表明,类似于大屠杀这样的文化创伤却经常被国家和公众“遗忘”,比如国际社会长时间延迟对于二战痛苦的讨论,比如美国对于建国初期大量杀害本土印第安人事件的不提起,比如南京大屠杀在建国后历史文本中长达几十年的缺位。文化创伤教育,就是防止遗忘、增进民族和国家身份认同的有效手段。本文以国外犹太大屠杀的教学实践为例,讨论文化创伤教育中的三个基本论争。

犹太大屠杀已然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常识性事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犹太民族自身对于这一事件坚持不懈地进行追诉与书写,以至于产生了种类繁多且影响广泛的、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的关于犹太大屠杀的优秀文学作品和电影电视作品。另一方面,也是以色列乃至欧美各国在学校中持续推进大屠杀教育(Holocaust Education)的结果。

然而,大屠杀教育的学校实践,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总是与当代政治争论和地缘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即便是在学术界,关于大屠杀教育的目标、价值、年龄适切性、大屠杀否认言论的处理、全球化境遇等问题,也是充满着争议。本文试图结合以色列、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的大屠杀教育实践,引介国外大屠杀